



中国发展大战略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王立胜 著

ZHONGGUO
FAZHAN
DAZHANLUE

陕西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FAZHAN
DAZHANLUE

中国发展大战略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发展大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王立胜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 - 7 - 224 - 06866 - 5

I. 中… II. 王… III.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 ②邓小平理论—研究 IV. A84 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7720 号

中国发展大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作 者 王立胜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32 开 5.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6866 - 5
定 价	18.00 元

XU

总 序 石仲泉



我同立胜相识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前期。1988 年至 1991 年，他在山东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导师恰是我的北京大学的学兄樊瑞平教授。读研究生期间，立胜参与导师主持的“中国当代哲学”课题研究，接触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材料，“被晚年毛泽东忧国忧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呕心沥血的精神所吸引”（立胜语），遂决心将晚年毛泽东的研究继续下去。那时，我还不认识立胜，但是他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在大的方面同我多年所从事的研究是一致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学术活动中相识。立胜同我是两代人，我年长他 25 岁，但是在学术方面的交流中，我们结下友谊，成了朋友，也就是人们说的“忘年交”。

选择晚年毛泽东作为研究方向后，立胜果然苦心孤诣，时废寝食，以“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题目，写出十几万字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经过扩充、完善，形成了他本人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第一部专著——《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这时，应该



说，立胜从事毛泽东研究并不太久，但其著作已经显示出扎实勤勉的精神和后人可畏的功力。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奖掖后学，出版了立胜的著作，引起同行关注，还被评为“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研究生毕业后，立胜到了山东省委党校工作，依旧围绕自己所选择的方向，矢志不渝，潜心读书和著述，陆续写出了数十篇有关毛泽东研究的论文。特别是在他第一部研究晚年毛泽东的著作出版后五年，他再次撰写了《重新认识毛泽东》的专著。用立胜自己的话说，这部著作“凝聚了自己的一些心血”。毫无疑问，这部专著反映出作者在第一部专著出版后一些新的思考，在深度和广度上对晚年毛泽东的研究又大大前进了。

这些年来，立胜在继续研究晚年毛泽东的同时，又开掘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邓小平理论。他写了不少有关邓小平理论的文章和著作。不过，立胜的研究不是把对晚年毛泽东的研究同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分割开来，而恰恰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用联系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对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作深入考察和分析。从研究晚年毛泽东的角度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视角。从比较的角度研究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使得两者的研究互为推进，相得益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他参加樊瑞平教授、张乐岭教授主持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课题，参与撰写了这部专著，已经取得了成果。而这次即将出版的《中国发展大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更是立胜本人作这种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

从1993年《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到1995年《重新认识毛泽东》，再到2003年写出《中国发展大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恰好十年。这十年间，立胜的研究成果当然不只是这三部专著。粗粗算来，这十年他写了十余部著作（包括合著）、四十余篇文章。不过，这三部专著颇有代表性，五年一部专著，五年一个台阶，渐次深入，循序拓展，正好反映出他的研究历程和轨迹。

立胜刚刚年届不惑，经历比不少同龄人丰富。当过省委党校的教研室副主任，在县里挂职锻炼过两年，做过地级市的市委副秘书长，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县长，现在是县委书记。从学者到官员，是立胜面临的一次角色转换。北京山东两地相隔，立胜如何完成这个转换，我没有直接观察，但是朋友、熟人不时传来他的消息，都是肯定和好评的消息。听说他到县里任职时间不长，就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在招商引资、经营城市、调整结构和外经外贸等方面下大工夫，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这些消息中，我逐渐得出了关于立胜的印象：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开拓创新。这几年，同立胜有过几次见面，每次都感到他高昂的精神状态、实干的价值取向和清晰的发



展思路，同我听到的消息完全吻合。更令人感到高兴和值得称道的是，立胜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一直没有间断理论研究工作，除在报纸杂志经常看到他结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而写成的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外，还撰写了新的学术著作。据说他还基本完成了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探讨“三农”问题的著作《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从这些理论文章和著述中，可以看出立胜始终不渝的理论研究和探索的追求。立胜晚年毛泽东的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难点。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郑重的结论。但是，学术界和社会上对晚年毛泽东的看法和评价还是有许多分歧和争议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简单肯定和全盘否定两种。立胜的研究著述同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不同，既肯定了毛泽东晚年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提出的一些有重要价值的理论创见，以及实践中的成功之处，同时也指出这个探索中发生的重大失误包括全局性失误，正是这种失误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这绝不是庸俗的折中主义，而是对复杂曲折的历史的客观反映。对晚年毛泽东探索的这种基本态度，其实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立胜的研究，最大的特点还是长于思辨。这自然得益于他所学的哲学专业，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本人在理论方面的修养和造诣。他的著述，显出对丰富资料的驾驭能力和对具体史实的抽象能力。因此，这些著述既不是一堆史料的累赘罗列，也不是一套逻辑的冗长说教，而是有史有论，论从史出、史证结合。正是因为这种擅长思辨的特点，立胜的研究有许多独立见解，而非人去亦云。这是他年纪尚轻却已为学术界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英豪辈出，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精英不断聚集在党旗之下。一批又一批卓越的领袖，各个方面杰出的伟人，都对党的创立、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沉思历史，回首沧桑，还是数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的影响最为深刻。他所建立的功业无以出其右者。就是其晚年对党的历史的负面影响，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现在以新的视野重新审视历史，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铸造新的辉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与党的奋斗历程

在中华民族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欺凌沦为殖民地之后，近代中国有许多仁人志士、进步团体和革命力量寻找救亡图存之路，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最初的直接目的也是为了救国救民。她的高明之处在于，分

析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又一次斗争失败的直接原因之后，以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阶级，同时团结其他革命阶级和阶层的力量，来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找到一条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的认识，是经过艰辛探索的。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如何进行建设，也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并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逐步有了认识。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经历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他领导党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艰难地开拓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党的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的烙印。党自创立之始，毛泽东就对各方面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革命时期已崭露头角。但是，对党的历史产生的主导作用，作为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主角，还是从井冈山斗争开始。毛泽东一生对党的奋斗历程的贡献巨大，功勋卓著，可以从许多方面作概括。这里，笔者着重论述以下几点：

一是缔造了一个新中国。

党自创立以来就在为推翻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斗争。尽管曾经取得过大革命胜利的辉煌，但随后就遭受到严重挫折。面对强大的反革命力量，一个时期，党找不到应对的正确的政治军事战略和策略，在错误路线领导下甚至还濒临绝境。只是在遵义会议实际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逐渐形成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才使革命力量不断地转危为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后战胜内外反动派，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从而，一个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结束了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重新屹立在亚洲东方，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她的巨大作用。

二是开辟了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斗争道路。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开辟中央苏区，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进一步结合起来，为党创建了当时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他在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首先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向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在大革命遭受挫折，党发动的一系列城市武装暴动失败之后，毛泽东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开辟的一条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道路。党的二大初



步将纲领作了区分，确定先进行民主革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之后，毛泽东通过对直至抗日战争党所经历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规律，明确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在党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一段全国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到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召开，我们国家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这又是一条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出发所开辟的革命转变新路。

三是至少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两大奇迹。一是遵义会议后的红军长征。土地革命战争中期中央的错误领导，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在战略大转移过程中的错误军事指挥，又使红军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直接指挥军事，四渡赤水，穿插川黔；奔袭云南，巧渡金沙；强越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走沼泽，通过无人区；最后完全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获得新生。这万里长征在地球上绘就了“红飘带”，是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故事，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壮举。

二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转战陕北。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国外势力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反对，背信弃义，悍然发动内战。战争之初，反动派的气焰嚣张至极，声称只需三个月，至多半年，就能消灭共产党。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人民军队很快粉碎其全面进攻。在国民党军队转向重点进攻陕北时，毛泽东坚持不离开陕北，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军周旋。同时还运筹帷幄，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所以如此，除了陕北的特殊地貌等自然条件不利于敌军大兵力展开，并有利于我军小部队在峻岭深沟中活动外，更重要的是党和军队在这里有十多年的深厚群众基础。老百姓深深地爱戴党，千方百计地保护党中央，这种群众优势是其他有些地方难以具备的。因此，在整整一年时间里，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前委，在山沟里“打转转”，即使几度遭到敌军围困，也毫不动摇。只是在我军由防御转为反攻后，为了更有利于指挥全国战争才渡过黄河。如周恩来所说，毛主席在两孔窑洞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

这两次都是毛泽东创造的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他的卓越的军事战略和高超的军事艺术的生动体现。

四是铸造了光耀世界的三度辉煌业绩。

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八十多年波澜壮阔的极不平凡历程中，取得了光耀世界的五度辉煌。除党参与领导大革命的辉煌时毛泽东还不是党的主要领袖，以及在他谢世之后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所创造的令世界震惊的辉煌外，在他作为党的主要领袖的几十年间，为党铸造了光耀世界的三度辉煌业绩。

——抗日战争时期的辉煌。在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之后，党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领导全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党不仅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且通过抗日战争得到空前发展壮大。到抗战后期，党已成为拥有一百多万党员、一百多万正规军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根据地和一亿多人口的大党。这是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一个关键发展时期。它使党获得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内战之后敢于与其进行政治军事较量的“资本”和资源。

——解放战争的辉煌。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我们党也曾设想可能出现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并为此做了巨大努力。但是，国民党反动集团悍然发动内战后，毛泽东对不利形势和困难局面作了充分估计，准备再来一个“八年抗战”，夺取胜利。但是，在他的正确领导下，人民军队扭转战争初期的困难局面后，迅即由防御转为反攻，经过大决战到大进军，总共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就把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解放了除台湾外的整个中国，夺取了整个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八年的辉煌。建国伊始，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各项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相比较都位居前列。新中国的进步举世瞩目。在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建设的同时，进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着缺点和偏差，但整个说来，比较顺利地实现这样一场异常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党的八大前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初，还提出一系列富于创造精神的新的方针和设想。这八年的辉煌，使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包括之后探索社会主义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经验教训，做了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准备。

二、毛泽东与党的思想理论

近代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一定要有正



确的理论指导。一百多年来的革命运动和进步斗争可歌可泣，包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观察和改变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实现者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诞生的。它用先进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指导革命的正确理论，从来不能搞照抄照搬一类。历史实践证明，不仅维新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能救中国，而且就是有马列主义，如果将马列主义教条化，同样也不能救中国。只有把马列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理论，才能成为拯救中国、夺取革命胜利、引导革命事业发展的法宝。

我们国家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在这样的国度里，不仅进行革命比马克思主义本本上讲的困难得多、复杂得多，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情况结合得好，也是很不容易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苦苦地求索。党的早期领袖和革命家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用它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驱。

从毛泽东自投身中国革命之日起，就致力于研究中国实际。他早年不外出留学，这是一个重要考虑。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他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的一些个人特质，使他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方面，能取得更为卓越的成就。比如，他出身农民家庭，与中国农民的天然联系，有利于他更能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他具有极高的领悟能力，有利于他更能准确地把握马列理论的精神实质；他求知欲极强，通融古今，为他更突出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注重社会实际调查，对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党经过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的严重挫折后，选择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袖。全党经过对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挫折的反复比较，经过延安整风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最终形成共识，在党的七大确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创立的第一个伟大思想理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有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伟大革命。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它包括党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体现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应对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如何革命、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党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以后所创立的伟大理论成果，都与它一脉相承，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十六大仍将它作为指引党前进的一面伟大旗帜。

毛泽东思想作为继续指引党前进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就其整体而言的。但是，它既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那么它同任何思想理论一样，就会有基本的和非基本的层次，有长远起作用和非长远起作用的内容，有更为重大理论价值和次重大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从对党的历史发生的巨大作用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来看，从党在新世纪肩负的历史重任来看，有这样几点需要更加强调：

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尽管党从创立之始，就在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前述那些理论先驱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将这个原则在革命实践中运用得最卓越、贡献最大，并在理论上明确指出、不断加强，谆谆教育全党的是毛泽东。因此，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定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思想。毛泽东在最初讲“相结合”这个原则时，是强调两个方面：既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又强调要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即是双向结合、互动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之后，在论述这个原则时，又进一步强调：马列主义理论不仅要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还要与建设实践相结合。这以后党的文献的表述，就更多地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表述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实践证明：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原则时，革命、建设和改革就取得胜利，获得成功；反之，就发生失误，遭受挫折。因此，毛泽东思想的这条根本原则，是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的。

二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主。这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并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理论和组成部分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主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虽然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最先提出的，但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而特别加以强调的。毛泽东提出，要坚决反对只片面地引用马列主义的个别语句，而不会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教条主义，强调要区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正确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才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强调和掌握，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有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毛泽东思想也有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具有中国的、民族的特色，因而其立场、观点、方法的某些侧重点会有所不同。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中国共产党人最强调的思想观点看，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因此，第二个《历史决议》在重构毛泽东思想体系时，将这三个基本点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毛泽东思想，同对马列主义一样，也有一个科学态度问题。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正确地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不断地与时俱进，发展毛泽东思想。

三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毛泽东思想诸多理论中，最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是毛泽东思想所以能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这个理论包括革命和建设两方面的内容。它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的分析，阐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目标和前途等根本问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结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等。同时，又通过对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解放区建设和新中国初期建设新民主主义经验的总结，不仅提出而且不断丰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初步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又阐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建设转变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建国之际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等，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包括革命和建设两个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革命转变理论的伟大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四是毛泽东哲学理论。八十多年来，在党的众多领导人中，有专门的哲学理论著作，形成系统的哲学理论，建构起有特色的哲学体系，并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做出重要发展，真正称得上大哲学家的，只有毛泽东。尽管他的某些哲学观点，在哲学界存有异议，但这不妨碍他被尊为辩证法大师的崇高地位。他的大量科学著作都有哲理性，尤其是《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地位》、《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既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许多经验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概括。这些著作中的某些具体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历史，但贯串其中的思想方法和阐述的哲学理论，会长时期起作用。毛泽东的正确哲学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它会随着毛泽东思想一样，对党发挥重要指导作用。毛泽东思想已经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它还将是继续哺育新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乳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时期21世纪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三、毛泽东与党的品格作风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马列主义党建理论要求建立的。但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立足于这样的特殊国情，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党的早期革命家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是，真正解决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的是毛泽东。他长期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伟大工程”来对待。邓小平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很丰富，几十年来，我们的党就是按照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来建设的，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直到现在，尽管党的建设理论有很大发展，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个为毛泽东提出而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路，但我们党的品格作风基本上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正确要求来塑造的。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来塑造，使党具有很多独特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道的优良品格作风。比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关系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自由讨论学术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提出“斗、私、批、修、反”的口号，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方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教育，包括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教育广大党员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作为共产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是强调党要始终具有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品格的重要教材。当前，以与时俱进的、能够收到良好效果的好形式，用“老三篇”的精神，不断加强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是共产党防止腐败、跳出“历史周期率”，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中的重要保证。

(二) 强调共产党要保持三大优良作风。共产党的先进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宣传上的，而是一定要通过它的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体力行而让老百姓看得见和感受得到的。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和异常艰苦的环境下能够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思想上的先进性通过广大党员外在的优良作风得到了活生生的体现。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将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作风作了理论概括，指出这主要有：一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二是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三是自我批评的作风（建国后完善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他强调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在共产党的许多优良作风中，为什么要特别突出这三条呢？毛泽东的考虑当然很多。最重要的是因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就要实践。这就决定了党的首要作风，必须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体现。自我批评的作风，以是否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党员思想和行为的准绳，不符合的就做自我批评加以抛弃，这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倡导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要求。有了这三条，就使共产党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优秀品质，凝聚更多的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精英。践行这三大作风，使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这是党安身立命之本，是党的力量之源、强大之基。

(三) 强调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党的强大战斗

力。中国共产党是为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明确的宗旨和任务，要求它必须具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在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历史、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反映到党内来，会腐蚀党的机体。从井冈山斗争始，毛泽东就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将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政治组织，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强调“支部建设在连上”，基层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从地方到中央都要健全党的组织系统；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决定问题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但在行动上要步调一致；强调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正确处理党内各个部门、地方和各种利益的关系，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强调正确开展党内的批评和斗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最后要达到团结的目的，反对任何破坏党的团结，制造分裂的错误行径，自觉地维护党的统一。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用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教育全党，因此，即使在党发生严重挫折时也没有发生分裂。这是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的一条重要纪律保证。

（四）强调立党为公，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正确的干部路线是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毛泽东一直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选拔和使用干部，提倡“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提倡“五湖四海”，反对宗派主义。党的干部政策，应以能否坚持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公道正派，不谋私利为标准。党的干部要有政治远见，襟怀坦白，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人民、为阶级、为党勤奋工作，要有不怕困难、脚踏实地、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任劳任怨、富于牺牲的精神。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为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的栋梁之材。这是新中国得以诞生，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干部条件。没有毛泽东为党培养和造就干部付出的巨大心血，就没有今天党的辉煌成就。

（五）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精神，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反对腐败，从严治党。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由于环境所迫，保持它的先进性，发扬三大优良作风，是不那么困难的。在革命胜利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后，能否继续保持它的先进性，这既是各方面人士所关注的，也是毛泽东始终重视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提

四、坚持毛泽东科学思想，发展毛泽东的伟大事业。

发展毛泽东的伟大事业

13 ■

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符合党的实际的，不仅能经受住已往历史的首肯，也能经受住未来历史的检验。正如马克思在世界上能排名千年历史伟人一样，我相信，毛泽东能在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伟人榜上排居首位。

第二，对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要作历史的科学分析。《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犯错误的复杂历史条件，包括国内原因和国际背景、理论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以及个人主观因素的分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发生的。由于中国国情的异常复杂和特殊，由于客观形势发展的瞬息万变，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抄照搬，也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从这一方面说，他晚年的错误属于探索过程中的错误。按照他自己说的，是一种“试验”。当然，“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试验”，是错误的“试验”，是陷入误区、步入歧途的探索。今后要引为史鉴，永远不能再进行类似的“探索”，更不能不顾全党大多数人的反对做这种“试验”。强调这一点，不是在寻找客观“说词”，而是为了更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这样说，丝毫不是在减轻毛泽东的错误的分量，只是更全面地认识他犯错误的原因。这两者是不应当混为一谈的。

还有一个如何看待领袖人物的品质的问题。目前有一种刻意从毛泽东和其他领袖人品如何如何来分析党犯错误的原因的观点。不能否认，领袖人物的性格品质，会对历史的走向和特点产生一定影响，并打上个人的色彩和印记；但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简单地归结为个别的领袖人物的某种品格，这从来不是严肃的科学的分析历史的方法。仅就领袖人物的品格而言，也是多面的，而不是单一的。同任何普通人一样，他们不会没有弱点、缺点，但能成为领袖，其优点、长处就是主要的。领袖人物的弱点、缺点，会对历史产生负面影响，但更要看到，其优点、长处对历史产生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因而，即使讲领袖人物的性格品质对历史的影响，也应作多角度和多侧面的分析，而不能只是单挑出某一个方面论说。再则，讲历史，仅仅讲领袖人物的品格，它充其量只能表面地描述历史，而不可能深刻地提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更何况把领袖人物“妖魔化”、“丑陋化”、“恩怨化”等，这本身就没有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又怎么可能正确地说明复杂的历史事件呢？这样的结果，只能扭曲历史，而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毫无疑问，毛泽东晚年有复杂的心态，但要分清哪种是主导的、基本的。他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他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状况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状况很不满意，违背了他过去倡导的要区别“延安和西安”的认识问题的方法，错误地将“延安”当做“西安”来